

索绪尔符号学的解构之维

李永毅

内容提要 索绪尔所意指的语言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系统，和西方哲学传统中的语言不是同一个概念。在这个系统中，语音和书写都不具备实体地位，都只是语言差异性、关系性、反向性原则的外显形式；他所认为的符号是非物质性的、心理的，其值是由系统赋予的。德里达一方面从他的差异性原则发展出了“延异”这个解构主义的核心术语，一方面也误读了索绪尔理论中貌似形而上学传统的因素。就思想倾向而言，索绪尔和德里达有不少相通之处。

关键词 德里达 语言学 符号 差异 解构

自1967年德里达发表《论书写学》（*De la grammatologie*）以来，语音中心论（le phonocentrisme）就成了索绪尔的一个标签。论者无论支持还是反对德里达，他们注意的焦点似乎都在德里达的逻辑上，很少把德里达引述和阐释的索绪尔放回索绪尔本人著作的语境中，考察索绪尔是否真是语音中心主义者，因而遮蔽了索绪尔理论的复杂性，也无法充分揭示索绪尔这份遗产对于解构主义的意义。一方面，德里达领悟了索绪尔思想的核心不是能指（le signifiant）/所指（le signifié）等一系列二元对立，而是为它们赋值的差异（la différence），并以此为基础演化出他自己的标志性词汇“延异”（la différance）。另一方面，德里达也过于草率地把索绪尔的符号观纳入形而上学传统，尤其是把他关于语音的论述与胡塞尔的现象学混同，从而严重误读了索绪尔。令人惊异的是，尽管存在这样的误读，索绪尔对德里达的影响以及两人精神旨趣的相似性仍远远超出了德里达所意识到的程度。为了厘清索绪尔符号学与德里达解构理论的关系，本文将对《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下文简称《教程》）和《论书写学》的相关部分做一番细读的比较分析，并将两人的比较延伸到他们的其他著作。

一、虚幻的语音和虚幻的语音中心论

德里达指控索绪尔语音中心主义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教程》的这句话：“语言学对象的定义不是写出的词（le mot écrit）和说出的词（le mot parlé）的联合体，后者单独构成了这个对象。”^① 德里达由此认为，索绪尔在书写和语音之间制造了一道鸿沟。他的解读是，“词（vox）已经是意义和声音的结合，观念和声音（voix）的结合，或者用更严格的索绪尔语言说，能指和所指的结合”^②。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此用法语 voix 和拉丁语 vox 这两个表示声音的词直接替换了索绪尔原文中“说出的词”这一概念。他还用胡塞尔现象学的语汇对索绪尔的观念做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语音相对于书写的优越地位意味着“声音与存在、声音与存在的意义、声音与意义的观念性（idealité）的绝对邻近”（*Grammatologie*：23）。索绪尔就这样被纳入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柏拉图和卢梭将书写视为人类堕落的开始，亚里士多德将书写视为“符号的符号”，胡塞尔将心智内部的声音视为最理想的语言形式，所有这些观点似乎都浓缩在索绪尔的语音中心论里。

然而，这样的解读有断章取义之嫌，也违背了索绪尔符号学的基本原则：系统里的任何一项本身并无意义，它与其他项的差异才赋予它意义。因此，要更好地理解“说出的词”这个概念，我们必须回到索绪尔的术语系统。按照索绪尔的规定，语言学研究的“具体对象”不是“言语行为”（le langage），也不是“言语”（la parole），而是“语言”（la langue），而“语言”在他的定义中指隐藏在日常语言应用背后的以差异性为基础的系统，“言语”则是“语言”系统及其原则的外显形式，语音和书写都包含在其中。《教程》中有一个简明的公式：“对于我们而言，语言就是言语行为减去言语。”（*Cours*：112）由此可见，当索绪尔在严格意义上讨论“语言”时，语音（包含在“言语”里）已经被事先排除了。正因如此，他反复强调，词（le mot）或者语言符号（le signe）不具备物理特性，只具备心理特性。索绪尔把符号的能指一面称为“声音形象”（l'image acoustique, l'image vocale 或者 l'image verbale），而不是“声音”，就是要突出符

^①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Charles Bally, Albert Sechehaye, and Albert Riedlinger, eds., Paris: Payot, 1971, p. 45.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② Jacques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1967, p. 47.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 *Grammatologie* 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号的本质不是语音（当然也不是书写），而是它在我们心智中唤起的形象，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唤起的是我们对它与其他符号差异的感知。因此，当索绪尔把“说出的词”定义为语言学的单独对象时，“说出”是心理意义上的声音，换言之，“说出的词”指的是语言符号本身。

但无论是“声音形象”还是“说出的词”都容易让人将语音误认为语言符号的属性，索绪尔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些命名的局限，所以在《教程》中做了澄清。他担心语音学的音素（le phonème）概念会将物质声音的概念附着在语言符号上，因而指出“音素归根结底是对照性、关系性、反向性的实体”（*Cours*: 164），并无内在的本质，只有在与其他音素的对比中才有意义。书写体系与此类似，他把字母的外显形式称为它们的“值”（la valeur），声称“字母的值纯然是反向性、差异性的，书写的值只能在一个由特定数量字母构成的确定系统中，按照彼此的对立发生作用”（*Cours*: 165）。由此可见，索绪尔的语言学由三个层级构成，里层是他假设的抽象的、非物质性的形式原则（“语言”），中间层是介于抽象与具体之间的表现手段（语音和书写），外层是具体呈现出来的语音和书写（“言语”）。语音始终处于与书写同等的地位，并不是什么中心。如果说索绪尔的思想中仍有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沉淀，那也不是体现在所谓的语音中心论里，而是体现在上述层级结构背后的二元对立思维框架：可能/现实、虚拟/真实、形式/物质、不变/变。但在建立一门新学科的过程中，这样的框架是有效的手段，而且索绪尔最终超越了这套思维。

既然语音和书写同是语言的外显形式，索绪尔为什么单独把“说出的词”作为语言学的对象，而把“写出的词”排除在外呢？他的理由与历史上的语音中心论并无瓜葛。柏拉图贬低书写是因为文字远离了语音所依凭的在场的说话者，无法回答读者的质询，无法保证读者的理解，也无法为自己辩护，^①或者说书写的过度自由威胁到了真理的传达。索绪尔却认为，作为语言的外显形式，书写的缺点在于过于拘谨。视觉形象比声音形象的轮廓更鲜明，书写系统也比语音系统稳定，但这种更强大的呈现能力反而遮蔽了语言的无形特性，限制了它的无限发挥。^②“写出的词”比“说出的词”更容易让人产生语言就存在于物质载体

^① See Plato, “Phaedrus”, in E. Hamilton & H. Cairns, eds., *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69, 275a–276b.

^② See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Rudolf Engler, ed., Wei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67–1974, 1. 266.（这是一个逐句标注的四卷本评述版《教程》，引用此书时，1后面的数字表示句子编号，N后面的数字表示注释编号，下同）

之中的错误印象。当时流行的发音观念就印证了这一点：“当人们说某个字母的发音应该是这样或那样时，他们就把形象当成了模型本身……它意味着语言在这方面反而要依赖写出的形式。”（*Cours*：52）

总而言之，索绪尔所命名的语言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系统，和西方哲学传统中的语言不是同一个概念。在他的系统中，语音和书写都不具备实体地位，都只是语言差异性、关系性、反向性原则的外显形式，在语言的层面，语音是虚幻的，语音中心论更是虚幻的。

二、普通符号学与书写学

索绪尔语言学的一个悖论是，声音其实没有声音：“词里面真正重要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可以将它和其他所有词区别开来的语音差异，因为是这些差异承担了意指（la signification）功能”（*Cours*：163）；能指“就其本质而言，全然是非语音的，无形体的，由它的声音形象与其他声音形象的差异构成”（*Cours*：164）。另一个悖论是，能指其实没有所指。能指其实并不指向“概念”（le concept）本身，而是指向自身的意指功能，指向自己在符号系统中的相对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能指有对应的所指，那个所指就是系统本身。

沿着这样的思路推进，索绪尔逐渐剔除了自己理论中残存的有形因素，“不再将符号视为相对关系的再现结构，而更倾向于把符号概念定义为一种纯关系的、不可再现的实体或条件”，语言层面的“对象”也逐渐褪下了“图像符号”或“标识符号”的外衣，“披上了符号学人工制品的透明薄纱”。^①当他思考自己的普通符号学（la sémiologie générale）时（*Cours*：111），他最终抛弃了传统的语文学话语，而用一种功能性的、操作性的话语取而代之。他用“事件”（l'événement）、“关系”（la rapport）替换了“对象”（l'objet）^②；用“项”（le terme）替换了“词”（le mot）。符号系统是一个“永恒的反向性差异构成的网络”，值是基于“概念的未确定性”而演绎出来的。因此，索绪尔的符号学已经越出语言学的范畴，他关注的是“先于图式化（la schématisation）、更先于语言表达的思想结构”。在这样的视角下，连接思想和语言的不仅是它们都被表达出

① James I. Porter, "Saussure and Derrida on the Figure of the Voice", in *MLN*, 101.4 (1986), p. 881.

② Se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N. 3299.

来的事实，而且是它们在此之前都未被表达出来的状态。^① 索绪尔感兴趣的是这个决定思想和语言形式的无垠的、混沌的系统，他说：“图式并不是语言的最初阶段，思想在一种语言的词语中的分布将思想本身的轮廓呈现给我们，一旦我们拥有了这些轮廓，图式就可以进入游戏（le jeu）。”^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游戏”一词，它几乎是德里达的标志性词汇。此处，它敞开了另一扇门，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索绪尔。结构主义者把索绪尔的理论构建为一种被差异严格决定的系统，但在索绪尔自己的著作中，差异却是一种“游戏”性的、自由的因素。对符号系统来说，“未确定性”甚至比差异更基本。符号的结构并非天然存在，而是系统赋予的，它是系统“未确定性”的一个延迟效应。在这个系统中，符号本身的价值为零，^③ 没有任何一个符号或概念具备独立的身份，“充当符号的对象下一次永远不会和上一次相同”^④。

当德里达宣称用“书写学”取代《教程》中的“符号学”时，他相信自己是在解放索绪尔已经发现却未充分发掘的逻辑，然而索绪尔本人已经完成这样的解放。德里达关于差异的洞见其实已经是索绪尔的洞见：“差异的游戏”是“无声的”，“两个音素之间的差异是无法听见的，唯有这种差异允许音素存在并以音素的形式运作……根本没有纯然语音性质的声音”。^⑤ 索绪尔所描绘的“符号学”宇宙与德里达的“书写学”宇宙在对自由、游戏、不确定性的强调上也并无根本分歧。德里达把书写视为语言的源头，但他所说的已经不是有形的书写（属于索绪尔的“言语”），而是无形的总书写（l'écriture générale）或者原书写（l'archi-écriture）了。在这个层次上，书写不再是语言的外显形式，而是造成差异、区分和变化的力量。德里达将林中小径作为广义书写的一个典型例子，因为小径的出现使得森林有了位置的划分，如同语言划分了人类混沌无序的经验。（*Grammatologie*: 158）索绪尔所称的先于图式化的“未确定性”就相当于总书写，它时刻制造着系统中的差异，而林中小径则代表了差异的图式化，代表了“未确定性”在具体情境中的凝定和呈现。德里达用“延异”取代差异（*Grammatologie*: 38），命名差异生产中的延宕和扩散时，其实

① See Porter, "Saussure and Derrida", pp. 884-885.

②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 1899.

③ Se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N. 3316. 1.

④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N. 3297. 1.

⑤ Jacques Derrida, *Marges de la philosophie*,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1972, p. 5;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只是用另一个词概括了索绪尔对符号系统运作方式的理解，并未真正跳出索绪尔的藩篱。

三、符号、隐喻与形而上学

索绪尔虽然很少用与德里达相似的激进字眼，但他的普通符号学思想同样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构成了严重挑战。德里达在《白色神话：哲学文本中的隐喻》中用解构主义的增补手法消解了“隐喻和概念的古典对立”（*Marges*: 314），但如果换用索绪尔的体系，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传统观念的缺陷所在。

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有一种倾向，就是怀疑隐喻性的语言，推崇非隐喻性的语言，认为后者才是“合法”的哲学语言。德里达却相信，没有任何话语“能以非隐喻的方式呈现出来”（*Marges*: 318）。德里达追踪了贬低隐喻的立场背后的整套逻辑：（1）思想或概念与现实之间存在关联；（2）某些概念忠实于现实，因此具备形而上学的正确性；（3）形而上学的理想语言应当选取这样的概念，使得每个概念的意义都独立于其他概念，建立概念与语言之间的关联；（4）这样的理想语言至少能部分实现哲学思辨，并且是哲学思辨的必要工具；（5）日常语言无法胜任这样的工作，因为它的符号彼此依赖，不能让每个基本符号成为“唯一事物的恰当名称”^①。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名称建立的是与概念和现实的关联，或者说心智与世界的关联，隐喻建立的却是语言内部的关联。隐喻即使有用，也是辅助的、次等的：“隐喻……被哲学确定为意义的一种临时损失，一种正当性的运作方式（它不会造成永久损害），一种不可避免的迂回，一种不越出地平线的历史，其目标是绕行之后重新占有字面的、正当的意义。”（*Marges*: 357）

在隐喻和概念（及其对应的现实）、隐喻义和字面义的对立关系里，显然后一项居于中心，前一项居于边缘。德里达颠覆这类二元对立的标准手法是增补，即揭示出边缘项并非是中心项的补充，而事实上已经包含了中心项的概念。形而上学传统之所以贬低隐喻，实质是把隐喻视为一种不正确或者说不正当的用法，因为它破坏了某个词和对应实体的联系，而通过该实体与另一实体的相似性或类比关系把该词挪用后者身上。（*Marges*: 294 - 295）按照这样的定义，隐喻的逻辑同时涵盖了隐喻和概念。隐喻和概念的二元对立若要有效，就必须跳出这种

^① Bernard Harrison, "'White Mythology' Revisited: Derrida and His Critics on Reason and Rhetoric", in *Critical Inquiry*, 25.3 (1999), p. 512.

逻辑，让两者都成为形而上学理想语言中的项，也即是彼此意义完全独立，并且各自与语言之外的实体保持一一对应的关系，显然这并非事实。隐喻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系统里的一个概念，它和其他形而上学概念构成了一个互相解释的网络，因此要跳到这样一种语言之外来建立隐喻义和字面义的区别是不可能的。^①

如果我们直接用索绪尔的符号学视角审视隐喻/概念二元对立的前提，可以更明晰地阐述形而上学逻辑中的问题。（1）思想或概念与现实之间的关联是可疑的，作为索绪尔体系里的所指，概念并不指向外部现实，它的意义由系统决定，也即是由它和其他概念的差异决定。（2）至少从系统本身的角度说，思想和语言符号一样，没有内在的身份，更不具备与外界现实的唯一对应关系。“没有预先存在的思想，在语言出现之前，没有任何意念可以成形。”（*Cours*: 155）（3）形而上学的理想语言不存在，因为如果每个概念的意义都独立于其他概念，将无法构成一个对照性、关系性、反向性的差异系统。（4）哲学思辨需要凭借思想和语言，思想和语言都服从普通符号学的“未确定性”原则，当“未确定性”进入图式化过程时，“思想并不因此获得物质形式，声音也不因此变成精神实体”（*Cours*: 156）。（5）日常语言的确不具备非隐喻性，但隐喻性意味着语言能建立更丰富的关联，更凸显了它的无限性。概括起来，形而上学传统的隐喻观没能理解符号的非物质性特征和语言的系统性特征。

四、从共时符号学到政治经济学

索绪尔符号学与经济学最明显的连接点是“值”/“价值”（在法语中都是 *valeur*）的概念和系统通过差异反向赋值的运行方式。没有值的概念，符号的任意性、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区分就失去了依存。^②如果把语言符号的值得理解为商品的价值，那么索绪尔的理论就可解释为对价值生产、交换和流通的描述。所以，德里达将索绪尔的符号理论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尤其是对使用价值的分析。当然，这样的灵感并不完全来自德里达本人，他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和尼采的传统，一方面也吸收了索绪尔理论中固有的经济学因素。

马克思和尼采都意识到了语言与货币的相似性。货币作为符号可以替代物品

^① See Harrison, “‘White Mythology’ Revisited”, pp. 514–515.

^② See Gregory S. Jay, “Values and Deconstructions: Derrida, Saussure, Marx”, in *Cultural Critique*, 8 (1987–1988), p. 162.

的位置，从而实现价值交换和流通，语言符号也具有与商业相仿的功能。^①德里达说：“钱币上的图文经常是语言学和经济学交叉点，两者发生交换的场所。两种能指在拜物教的问题里互相补充，尼采如此，马克思也如此。”（*Marges*: 257）马克思在讨论货币和商品拜物教时，都突出了它们如何超越自身“物”的属性，表现出“符号”的功能。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某些相对而言几乎没有价值的东西，比如纸，却能充当金币的符号”^②。尼采在分析真理的概念时，反过来用了经济学的视角，把它形容为“图案已经磨蚀，不再被视为硬币而被视为金属的硬币”^③，这意味着所谓真理的概念只是流通的符号（“硬币”），却被人忘记了其隐喻性（“图案”），而被当做一种实体（“金属”）。

索绪尔也曾直接用经济学的类比来说明语言学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概念。正如经济学分为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语言学研究也有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和政治经济学一样，共时性语言学关注的也是值/价值，也是研究“不同类别事物的等值系统——对于前者而言是劳动与工资，对于后者而言是所指与能指”（*Cours*: 115）。这样的类比是值得咀嚼的，如果工资相当于能指，劳动相当于所指，那么工资和劳动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它们的值是由系统赋予的。“系统赋予”意味着三种作用，一是能指与能指子系统中其他项之间的差异，二是所指与所指子系统中其他项之间的差异，三是整个意指系统对能指所指对应关系的分配。因此，劳动与工资的等值关系与劳动者所感觉的二者是否相称并无关系，而是取决于社会的劳动结构、工资结构和分配结构。

如果我们按照索绪尔的理论来分析政治经济学中的另一对重要概念——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么交换价值就是能指，使用价值就是所指。无论使用价值还是交换价值，它们的“价值”都不是内在的、固有的，而是由系统的差异决定的。而且，正如符号学中的能指其实指向的是自身的意指功能，交换价值也并非使用价值的对应物，而主要是“交换”和“流通”功能的体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奢侈品的消费，奢侈品的交换价值高，并非使用价值大，而是因为它们作为一种身份的标志，具有很强的符号功能，在交换中深受青睐，被系统赋予了优先

^① See Marion Grau, “Erasing ‘Economy’: Derrid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ivine Economy”, in *Crosscurrents*, 52.3 (2002), p. 362.

^② Karl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aurice Dobb, ed., S. W. Ryazanskay, tran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0, p. 113.

^③ Friedrich Nietzsche, “On Truth and Lying in a Non-Moral Sense”, in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Leitch et al., eds., New York: Norton, 2001, p. 878.

的地位。这样的理解与马克思的理论很不相同。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是劳动产品更基本的属性，交换价值掩盖了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真实关系，污染了使用价值的纯洁性。所以，他所设计的共产主义社会用按需分配的方式取消了商品交换，也就取消了交换价值，只剩下使用价值。从索绪尔符号学的角度看，这种脱离了能指的所指是不可想象的，就像思想不可能独立于语言存在。

德里达对马克思使用价值理论的质疑也是以索绪尔的符号学为基础的。他意识到，如果使用价值可以独立于交换价值存在，它就成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所梦想的那类超验所指（le signifié transcendantal）。然而，所指只能和其他所指和能指共存于一个差异性的系统中，所指要成为所指，能指的意指功能就必须发挥作用。德里达试图证明的正是这一点也适用于使用价值。他认为，纯粹的使用价值不存在，“既然使用价值的一个特征是，它有可能被另一个人用或者在另一个时间用，这种他性或可重复性就已经先验地将其投射到等值交换的市场上了”^①。也即是说，作为所指的使用价值已经天然地包含了作为能指的交换价值的因素，正因为使用价值具备交换的可能，我们才能够在不同的使用价值之间进行交换。正如概念具备映射为声音形象的可能，我们才能借助声音形象交流不同的概念。反过来，德里达也为交换价值做了辩护。他认为交换价值不是污染，反而包含了“解放的承诺”，因为它保证了没人能独占一切使用价值。^② 正如没有作为能指的声音形象，即使作为所指的概念能单独存在，它们也只能囚禁在彼此隔绝的大脑中。符号系统的首要功能便是交换和流通。

五、符号系统的外部因素与意识形态分析

在《教程》中，索绪尔主要研究的是语言的理想状态，悬搁了影响语言的外部因素（纵向的历史演化和横向的时代语境），以便不受干扰地考察语言系统内部的运行规律，但他并非没有意识到从外部作用于语言的力量，并特意提醒语言研究者不要忘记它们的存在。这些论述虽未充分展开，却为更全面地理解语言提供了帮助，尤其是为语言的意识形态分析预留了空间。在这一点上，德里达也受到了索绪尔的启发。

^① Jacques Derrida, *Spectres de Marx*, Paris: éditions Galilée, 1993, p. 257

^② See Robert Lawrence, "Impatience: On Derrida, Milbank and the Decision", in *Political Theology*, 12.1 (2011), p. 35.

任意性 (l'arbitraire du signe) 是索绪尔符号学的著名原则, 在语言学研究中被常被人滥用, 但他本人对此却有极其严谨的论述: “虽然相对于它所代表的概念来说, 能指似乎全然是自由选择的, 但对使用它的语言共同体来说, 它却是固定的, 不自由的……没有任何人, 即使他愿意, 能够以任何方式改变这一选择, 甚至共同体本身也不能控制哪怕单个的词, 它完全绑缚在既存的语言上。”也即是说, 任意性描述的仅仅是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内在联系的特点, 并不意味着语言符号的选择不受约束。如果说这番说法只是重复了语言“约定俗成”的老生常谈, 那么接下来索绪尔的笔锋一转就令人惊异了: “我们再也不能把语言视为一种纯洁而简单的契约了……语言最好地证明了: 法律一旦被一个共同体接受, 就成了一种被迫忍受的东西, 不再是所有人自由同意的规则。”(Cours: 104) “契约”、“自由”、“同意”这些带有浓重政治学色彩的词无疑会激活洛克、卢梭等人的幽灵, 这里索绪尔似乎毫不费力地就揭穿了社会契约论的神话。社会契约论的前提就是主体的自由, 但索绪尔却暗示, 系统(语言、法律、制度等等)本身的制约和习惯的力量已经是阻碍自由的力量。不仅如此, 系统之外的因素也在作用于系统。他说: “一种具体的语言状态总是历史力量的产物, 这些力量解释了为何符号不可更改, 为何它能抵抗任何随意的替换。”(Cours: 105) 这就揭示了一个悖论: 语言系统表现出来的独立性和稳定性恰好是因为它是不独立的, 是外部力量争斗的战场, 它的所谓独立性(也是一种系统惯性)反而可以依附于外部力量的利益。外在于语言的因素在语言系统中留下痕迹后, 这些痕迹会在相当长时间里固着于语言内部, 以无辜的符号面目掩盖其真实的政治内涵。索绪尔将法律和语言做类比也极具洞察力。法律的能指虽然与公正的所指具有表面的联系, 但它也和语言一样, 是一个多种外部力量角逐的空间。

甚至索绪尔暂时抛开外部因素, 从共时性角度研究语言, 放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历史语境里, 也是一种高明的迂回策略。正是因为预先过滤了形而上学传统关于语言和外部现实关联的种种理论, 并用共时性的显微镜研究语言内部的关系, 索绪尔才发现了语言以差异性为基础的系统赋值原则, 否定了符号与概念、概念与现实之间存在实质性对应的传统观念。从他的符号学视角看, 认为某些概念具有永恒的意义, 认为某些符号具有真实内涵, 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

通过符号、尤其是语言符号来揭示意识形态, 是德里达哲学思辨的基本方法, 这一方法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索绪尔。索绪尔的差异理论对德里达

的书写学（我们可以戏称为“解构主义符号学”）影响深刻。虽然德里达认为索绪尔充满矛盾，所以要“用索绪尔反对他本人”，但索绪尔将差异视为语言赋值源头的观点始终让他激赏（*Grammatologie*: 77）。有了索绪尔共时性符号学的坚实基础，德里达便有了不拘于共时性的自由，可以在历时性的词语谱系和共时性的互文联想中，展开他的意识形态批判。他敏锐地察觉到，形而上学传统之所以根深蒂固，一个关键的因素在于，当人们未加甄别地使用相关词汇的时候，其实也就不知不觉地默认了形而上学的一些似乎是不证自明、然而却存在严重缺陷的基本前提。解构主义往往就是从语言的这种幽微之处发现形而上学思维的裂隙，进而在剖析其裂隙的过程中间接体现出自己的基本立场的。他对列维-斯特劳斯文化/自然二分法的质疑^①，对柏拉图笔下 *pharmakon*（“药”/“毒药”）一词的演绎^②，对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阐释^③，对马克思著作中幽灵意象的解读^④，都是著名的见微知著的例子。

[作者简介] 李永毅，1975年生，重庆大学语言认知及语言应用研究基地研究员，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英美诗歌、古罗马诗歌和西方文论。近期发表论文有《艾略特与波德莱尔》（载《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延异政治学：德里达的遗产》（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5期）、《卡图卢斯诗歌中的性元素：文化、伦理、政治与诗学》（载《国外文学》2011年第4期）等。

责任编辑：张 锦

① See Jacques Derrida, *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67, pp. 409-428.

② See Jacques Derrida, *Dissemination*, Barbara Johnson, trans., London: Athlone, 1981, pp. 61-155.

③ See Jacques Derrida, *The Gift of Death*, David Wills,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 82-97.

④ See Derrida, *Spectres de Marx*, pp. 10-24.